

跨学科视角下可译性问题的元理论反思

王洪林

(浙江万里学院 外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可译性作为涉及翻译本质的重要问题,多年来一直受译界学者关注。翻译学、变异学和文化符号学为进一步厘清可译性问题提供跨学科视角,有助于深化翻译本体研究。从跨学科理论视角切入,辨析相似性、变异性等概念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为进一步认识可译性问题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对“译”“易”“意”“异”几者深层关系的梳理为进一步理解翻译活动涉及的符号转换、意义再生和意义变异提供了重要理据。从跨学科视角对翻译核心问题进行的系统性反思从变异学视角对翻译意义再生中的变异性问题的分析以及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对可译性问题的重新审视,均对系统深化翻译本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可译性;翻译学;文化符号学;元理论反思;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6-0112-08

0 引言

语言、符号及其意义转换问题多年来受译界学者关注。而与其相关的可译性问题始终是译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文化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可译问题,但文化共性为翻译提供可能,因此翻译需在不可译处寻求可译的平衡点(汪国军,2010)。杨枫(2022a:2)指出:“知识的地方性是翻译的逻辑起点,也是不可译性的挑战和魅力所在。”许钧(2014)曾从翻译定义视角对可译性问题展开过深入探讨。谢天振(2018)也曾从译介学视角对不可译及其引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因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同一语言内部或不同语言之间,词汇与意义元素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Baker,2018:11)既然如此,翻译实践中遇到不可译现象实属必然。有学者从异质性角度对可译性问题进行元理论反思(方仪力,2020)。可译性问题涉及翻译实践和哲学两个层面。翻译实践中针对不可译情况,译者通常通过借助各种变通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贝克(Baker,2018:

收稿日期:2025-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影视外译符号意义再生与变异机制研究”(23BYY125)和浙江省教育厅重大人文攻关课题“‘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文化符号的符号书写与国际传播研究”(2023QN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洪林,女,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符号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王洪林. 跨学科视角下可译性问题的元理论反思[J]. 外国语文,2025(6):112-119.

10)曾指出:“当目的语中没有准确表达源语词汇同样意义的词汇时,译者该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贝克(Baker, 2018:24-45)提议采用更广义的词(上义词)、更加中性或情感没那么丰富的词,或借助文化替代词、外来词或外来词加解释、解释、省略、说明等方式。以上做法均为译者应对不可译所采取的变通手段。

针对翻译策略或方法无法回应的不可译问题,尚待哲学层面的阐释。张冬梅(2012:121)曾从哲学视角对翻译中的描述和规约关系展开过详细讨论,进而指出“描述与规约之争是‘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这一哲学难题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投射”。随后,张冬梅(2015)进一步从哲学视角对翻译中的“应该”问题展开元理论反思。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推进,翻译研究视角日渐多元,相关跨学科翻译研究方兴未艾。伴随翻译理论建设渐成体系,亟待对翻译理论体系创新展开元思考或元理论反思(黄忠廉等,2025)。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翻译核心问题进行理论辨析,进一步厘清翻译本质。在此背景下,与翻译活动相关的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的意义再生与意义变异、意义转换过程中的异与同,以及符号相似性等问题关乎翻译本质。鉴于此,下文将从“译”“意”“易”“异”之关系入手,进而从翻译研究、文化符号学双重视角切入对可译性问题展开讨论。

1 “译”“易”“意”“异”之关系

据《礼记·王制》记载,周代对翻译以及译者的描述如下:“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陈福康,2011:2)正是由于语言不同、文化差异,才需要借助翻译活动传达信息进而实现互相不懂对方语言的人士之间进行顺畅沟通与交流的目标。这也说明翻译活动因异而生。不少学者认为,异质性是翻译发生的前提和基础(Berman, 1984)。许钧(2014)曾指出,翻译活动本身源于“异”。关于翻译中的异质性和变异问题,变异学理论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讨论(曹顺庆,201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活动的目的是实现相互沟通与理解。那么,翻译活动是否真的“起于异”而“止于同”,还是“求同而存异”?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涉及翻译中的意义问题,更涉及翻译本质。

事实上,自翻译活动出现以来,从转换或“易”的视角对翻译本质的追问从未停止过。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提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陈福康,2011:3)这里提到了翻译的本质在于“易”,即交换、变换、改变。“换易言语”中,语言成为换易的对象,翻译的目的是“使相解”。问题是,如果翻译是交换语言,那么是交换语言本身还是语言的其他什么,比如意义?对此,学界展开系列讨论,包括交换语言的形式、内容以实现意义再生等。

西方对翻译本质问题的探讨同样源自翻译实践,也就是从“如何译”开始,逐步追问,最后回到翻译本身,追问“翻译到底是什么”。翻译研究从“字对字”到“意对意”,再到各层各类的对等问题,无一不触及翻译本质属性。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何为译这一翻译本质问题展开了系列讨论。中国古代的文质之争到现代的“信达雅”再到新时代翻译的重新定义与界定,大多也是围绕“翻译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换言之,该问题作为翻译研究主线始终是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

关于翻译中的意义再生问题,有学者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有译者曾将翻译描述为“打开窗户让光进来,移开井盖让活水流入”(Bassnett, 2014: 56)。这里的“活水”其实指的是流动或流变的意义。翻译活动的目的是引进新意义,而翻译活动本身又是原文意义的再生与新意义的生成过程。译者面对不可译的情况,通常会借助变通、变异尤其各种创造性叛逆手段来完成翻译活动。正因为不可译现象的存在,才使得翻译活动丰富多元,新意义的生成才成为必然。这也正是人们为何可以借助翻译活动产生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的原因所在,进而成为知识翻译学所考察的重点。知识翻译学理论从知识建构视角对翻译活动展开全新理解认识,重估翻译在知识生产、传播与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杨枫, 2022b)。已有的研究不仅有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也在发掘翻译的知识功能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2 跨学科视角下的可译性问题反思

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相关的是翻译活动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以及由此引发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似性与意义再生与变异等问题。可译性、相似性与意义变异问题近年来受到较多来自不同翻译研究范式学者的关注。然而,关于这几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背后的理论渊源,截至目前探讨还不够充分。鉴于此,下文从翻译模因论、比较文学变异学和文化符号学视角对可译性问题展开讨论。

2.1 翻译模因论视角下的相似性问题再审视

彻斯特曼提出的翻译模因论观点主要借鉴了生物学的基因概念以及波普尔提出的知识进化论观点,目的是从模因视角出发打通当下不同翻译理论范式之间的壁垒,找到不同理论范式之间展开对话与通约的路径(Chesterman, 2016)。与其说模因论是一种翻译理论,不如说是借助模因论对翻译开展的元理论探索。模因论的分叉相似与趋同相似观点为解读可译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

彻斯特曼讨论翻译模因的演变时,将翻译中的对等模因解释为相对相似性(relevant similarity),进而从相似性视角对翻译中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问题展开讨论,并进一步将相

似性细分为趋同性相似 (convergent similarity) 与分叉性相似 (divergent similarity) 两类 (Chesterman, 2016: 15)。事实上,这一概念最早由生物界学者提出,主要指物种进化中的两种趋势。趋同相似指不同物种在进化中日益趋同,而分叉相似则指同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生变异,从而导致新物种的或变异物种的出现。从本质上看,趋同相似是指不同源流经过意义的变异流变日渐趋同,即由异趋同;分叉性相似是指同源的东西演变为不同分支或支脉,即源于同,止于异。前者如差异较大的不同文明间有相似的地方,后者如同一文明或文化内部由于发生变异而产生的亚文明或亚文化差异。换言之,趋同相似指不同源流的文明之间存在趋同元素,具有相似性。属于源于异而止于同,即异中有同。比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原本看似不同的两个概念或两个事物,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两个不同的东西存在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就是趋同相似,属异中有同;与此相反,分叉相似是指相同中存在差异,同是因为来自同一源流,而异是由文化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异所带来的结果,属于同中有异。

就翻译而言,从趋同相似和分叉像似可有效解释跨文明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内部亚文化间的翻译现象。比如,就中西文明间的中英、中法、中西翻译而言,由于文明间跨度较大,不可译现象更为普遍,异中求同的翻译与趋同像似关系密切。而就欧洲内部语言,比如欧洲文化内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属于同中见异,与分叉像似密切相关。比如英法翻译中的“假朋友”现象就与分叉像似有关,看似相通的两个概念实则意义相差甚远。

2.2 变异学视角的意义变异问题反思

从变异学视角来看,分叉相似更多出现在同一文明内部的不同文化之间,而趋同相似更多出现于跨文明交流之中。这也是变异学提出的理据所在。变异学是在比较文学学科框架下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又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曹顺庆, 2014)。根据变异学观点,比较文学的理论基础是异而非同,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和变异基础之上。具体而言,语言、国度、文化、文明、时代、接受不同带来“文学信息、意义的改变、失落、误读、过滤”等,从而导致意义变异(曹顺庆, 2014: 5)。该观点对符际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从本质上来看,变异学对意义变异的讨论与翻译学讨论的分叉相似和趋同相似有互通之处。遗憾的是,来自变异学和翻译学的学者对彼此关注不够,尤其从彼此视角对翻译所涉及的符号表意行为及其带来的意义再生与变异问题关注不够。曹顺庆(2014)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旨在探讨文学文本在翻译之后所发生的语言、文本与文化变异,聚焦翻译之后的译文传播、接受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变异现象。变异学对译文生产过程由于符号转换所产生的变异现象疏于考察,较少关注翻译之前的语言和文化异质性。翻译活动发生的前提在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存在。翻译中的符号转换在实现意义再生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意义变异。从符号学的符际表意视角出发对意义变异进行考察具有较强的适切性。对翻译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异质性、变异以及差异等问题,王洪林(2022)从翻译学、符号学、变异学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随后,王洪林(2023)又从跨学科视角对意义再生与变异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符号学学者洛特曼也曾对分叉相似与趋同相似概念进行过富有创见的阐发与分析(Lotman, 1990)。根据洛特曼的观点,这两类相似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密切相关,而正因为不可译,使得新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也使得翻译成为新信息以及文学文化产生的主要途径。总之,趋同相似与变异学核心观点有相通之处,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借助翻译达成彼此沟通和理解。

2.3 文化符号学视角的可译性问题再考察

翻译研究关注的重点由“如何译”转移到“何为译”,继而追问“可否译”,由此可译性问题成了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已久。该问题不仅引起翻译研究界学者的重视,也受到符号学研究学者关注。比如,艾柯(Eco, 2001)从符号学与哲学视角出发对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进行反思。

洛特曼(Lotman, 1990)在文化符号学研究框架下,从语言功能视角切入对可译性问题展开富有创见的讨论。在洛特曼看来,不可译与语言的创造性功能密切相关。正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或不可译,才需要创造性翻译,即通过创造性叛逆将不可译变为可译。所谓的翻译不可译与可译问题,代表翻译可能性的两个极端,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几乎不存在完全不可译或者百分之百对等的现象。

洛特曼在探讨文本的三类功能时,讨论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他认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结合是决定语言创造性功能的主要因素(Lotman, 1990: 15)。这里提到的可译与不可译其实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可译与不可译。若是前者就等于完全对等,若是后者就无法实现跨文化交流与沟通。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事实上位于翻译活动的两端,而翻译活动就在介于两端的张力下进行。无论从符号表意自身来看还是从翻译实践来看,完全相同的译文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完全不可译或完全无法解读的符号原则上也不存在。暂时不可解或不可译都不能否认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依然有被解释的可能。广义上而言,所有翻译活动都涉及可译与不可译,而所有原文文本都是可译与不可译的符号组合。在洛特曼(Lotman, 1990: 15)看来,正因为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张力的存在,才会创造新信息与新意义,进而实现语言符号与文化的创新。由此可见,不可译反而是推动语言符号与文化创新的动力所在。

就翻译研究而言,文化符号学提出的关于文本作为意义发生器以及文化记忆机制的观

点,与文化模因论乃至翻译模因论有相通之处。作为文化模因的携带者,文本不仅携带着文化记忆,还携带着文化创新的因子或潜力(Chesterman, 2016)。正因文本具有创新性与文化记忆特征才使得文本作为新意义的生成器,发挥文化传承作用。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活动对文化之间的交互、文化创新以及文化传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从文本的文化记忆视角切入对翻译模因论展开研究的话,可找到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

文本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传承文化记忆和实现文化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康澄(2018:12)认为:“作为文化第一要素的‘文本’是文化记忆符号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该研究还提出“文本化”是对文化记忆的保存方式,而“去文本化”是从文本中对文化意义的释放与解读,是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刘禾(2017)从思想史发展脉络切入审视语际书写问题。该研究对文化符号学视角的符际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文化符号学研究者洛特曼(Lotman, 1990)提出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正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在语言符号层面没法形成对应,或源语文化语言能指在目的语文化里找不到所指,才造成所谓的“不可译”。然而,如果将翻译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活动的话,任何文本都可以被解释,也就可以被翻译。与此同时,正因两种文化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意义对等,意义再生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符号变形、意义变异,才为意义创新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2.4 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似性符号关系再解读

彻斯特曼(Chesterman, 2016:15)在讨论趋同性相似与分叉性相似时,将两者分别对应于皮姆提出的自然对等与方向对等。彻斯特曼从相似性角度出发,将自然对等与方向对等分别对应趋同相似与分叉相似。不过,这两对概念之间虽有交叉与相通之处,却不能简单将两者等同。皮姆(Pym, 2014)提出的自然对等主要指科学术语之间的可以实现一对一转换的对等,具有可逆性,也就是可以翻译回去,即实现对等性回译,而方向对等主要指两种语言关于同一概念的词语有交叉但不完全对等,因为翻译之后很难对等地翻译回去。

英汉翻译中不乏分叉相似的例子。比如,汉语的堂兄弟和表兄弟均可翻译为英文cousin,而cousin却指向汉语中的堂哥、堂弟、堂姐、堂妹以及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就是说,就这个概念而言,汉语翻译是多对一的关系,而英汉则是一对多的关系。具体意义的确定需要看上下文。彻斯特曼提出的趋同相似主要指两种原本相异的事物存在较大相似,分叉相似则指同一个事物由于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变异,导致区别。此外,同一文化的不同支脉之间同中有异。比如,欧洲同样源自拉丁文化的西班牙语语言及其文化与意大利语及其文化虽同源却有差异。这一点与方向对等有相通之处,然而不能完全等同。

总之,彻斯特曼在讨论对等模因时对相似性问题的讨论并将两类相似与皮姆提出的自

然对等与方向对等进行对比分析,创意明显。上文对两者进行了再比较与再解读,指出两者虽然相通但不可互换。自然对等的概念预设翻译发生之前已有对等意义存在,因而可以实现意义替换。方向对等概念则强调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不可逆性。这也是为何不同译者针对同一文本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从这个角度看,方向对等与分叉性相似的观点与蒯因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也有相似之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翻译模因论、变异学以及文化符号学对两类相似的讨论立足点虽不同,但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借助跨学科交叉分析,有助于实现翻译模因论、变异学和文化符号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而拓展了对翻译中相似性的认识。

3 结语

可译性作为翻译研究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在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层面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厘清可译性概念对认识翻译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从翻译、变异、意义和转换或易换几者关系入手,对可译性问题进行探源并从翻译和文化符号学双重视角切入对该问题进行跨学科元理论反思。通过从翻译学和文化符号学对可译性问题的多视角考察,以期对此问题有更深入、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从翻译实践层面来看,由于语言、文化以及认知方面的差异,以及特殊翻译文本类型本身的特点,使得翻译实践中不可译情况层出不穷。而从翻译中意义再生与流变层面来看,翻译面临两种语言、文化和符号域时,不同层面的差异导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翻译,不可译问题就成为翻译必然面临的问题。鉴于可译性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从多学科视角切入厘清其本质属性及其背后的机理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Bassnett, S. 2014. *Variations on Translation*[G]// S. Bermann & C. Porter.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4: 54-66.
- Baker, M. 2018.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3rd ed.)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erman, A. 1984. *L' épreuve de l' 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 Allemagne romantique* [M]. Paris: Gallimard.
- Chesterman, A. 2016.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Revised ed.) [M]. Amsterdam: Benjamins.
- Eco, U. 2001.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M]. (trans.) Alastair McEwen.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Lotman, Y. M. 1990.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 Pym, A. 2014.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2nd ed.)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曹顺庆. 2014. 南橘北枳[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福康. 2011. 中国译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仪力. 2020. 论洪堡特语言和翻译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向度[J]. 外语学刊(2): 102-107.
- 黄忠廉, 濮阳荣. 2025. 硬核与疑难: 中国译论发展探索之要[J]. 外国语文(3): 1-8.
- 康澄. 2018. 文化记忆的符号学阐释[J]. 国外文学(4): 11-18.
- 刘禾. 2017. 跨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洪林. 2022. 翻译之“异”的三重跨学科元理论解读[J]. 中外文化与文论(3): 323-332.
- 王洪林. 2023. 多重跨学科视角下的翻译意义再生与变异问题再思[J]. 翻译研究与教学(2): 87-92.
- 汪国军. 2010. 跨文化语境中的可译性研究[J]. 外国语文(6): 93-95.
- 谢天振. 2018. 译介学导论(第2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钧. 2014. 翻译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杨枫. 2022a. 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J]. 当代外语研究(3): 1-2.
- 杨枫. 2022b. 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定义与分类[J]. 当代外语研究(1): 1-2.
- 张冬梅. 2012.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翻译研究中描述与规约之关系的哲学阐释[J]. 外语学刊(1): 121-124.
- 张冬梅. 2015. 翻译之“应该”的元理论研究: 背景、任务与意义[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4): 138-142.

Meta-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ranslatability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WANG Honglin

Abstract: Translatability concerned with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studies, varia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semiotics offer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clarify the issue of translatability,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To cond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ranslatability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t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ideas for understanding translatability. By exami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vari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cruci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miotic transfer, meaning regeneration, and meaning variation inherent in translation proces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and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core translation issues, such as analyzing convergent similarity and divergent simila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s of translation, exploring variability in meaning regeneration through variation theory, and re-examining translatability from a cultural semiotics perspective, this work significantly advance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ranslation ontology.

Key words: translatability;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semiotics; meta-theoretical reflection; interdisciplinary

责任编辑: 陈宁